

# 中国与东亚政治改革 环境的比较分析

李路曲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批准号: 00BZZ009)

主 编: 李路曲

参加人: ~~胥 莉~~ 吴 敏 王臻荣 梁丽萍  
杜创国 曹永胜 董江爱 李宝莹

## 前 言

本课题从东亚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比较上分析了影响政治改革的诸多因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主要有：

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明显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继续长时期地在改革的外围迂回，继续长时期地听任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为害肆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我们比较多地注意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批判和清理则注重不够，甚至把某些实质上属于封建主义范畴的思想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和提倡，而把某些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思想却当作资本主义思想来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即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做的并不够，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仍然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我们现在和今后必须加大批判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力度，这是优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思想环境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二是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理解的不够深刻。

对此，我们应做到：第一，搞清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明，清除与之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更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进一步充分利用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当前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要认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本质属性，突破姓“社”姓“资”的主观和狭隘偏见。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是人类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共同财富，与社会政治形态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将二者完全混淆和等同起来。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的相当一些政治文明成果，主要是政治活动的实现形式和运作方式，并不具有体现资本家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阶级性，而是具有体现政治实践方式效能和效益的科学性。而且，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必然要以资本主义业已取得的成果和进步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提高和升华，不可能完全抛开这个基础。生产力发展是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只要有利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推进，就大胆地吸收和借鉴。第二，要认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克服盲目地、简单化地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而予以拒绝和摈弃的错误倾向。人类政治文明的任何成果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实际发挥作用的时候，都要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选择相应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要通过这些具体表现形式去挖掘和认识其所蕴含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决不能仅以这种具体表现形式“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不去吸收和借鉴它所蕴含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这种态度和做法，只会使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三，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要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准绳，以“三个代表”为宗旨，决不能以某个掌权者的主观好恶和自身利益为标准。进一步优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环境。第二，深入研究政治改革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全面推进政治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

东亚从传统权威主义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全能性政府模式向新的政府职能模式转变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迪是深

刻的。第一,应依据本国的发展状况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权威主义可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但不能成为它们否定民主政治的理由,应当根据东亚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来推进民主政治。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推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有利于形成社会整体动员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超常规的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公正,使社会发展成本急剧增高,表现为官僚机构的权力无限膨胀,却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而没有制约的政治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之后,应当及时地向民主的政体转换。对于统治者来说,在面临民主化的压力时,必须而且也可以实现自我革新,不惜以牺牲既得利益和特权为代价,通过渐进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政体得到加强和完善。第二,全面地认识威权政治和中国政府加强权威的举措。在“四小龙”模式的示范作用下,新权威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日益流行,甚至出现了一种将权威主义绝对化,主张中国照搬“四小龙”政治模式的倾向。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确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威,这不仅是因为“四小龙”经验的启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处于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中国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强大的中央权威,就不可能解决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同领域发展的错位问题;二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压力,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要捍卫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权威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是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模式。它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范围和运作方式。“四小龙”在奉行权

威政治时,也不否认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在不同时期进行有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以后,“四小龙”并没有固守封闭的权威政治不放,而是逐步开始了由传统型政治向法理型政治的转变。

同时,不能将加强中国的中央权威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立起来。“四小龙”权威政治是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在服从权威政治的同时,又反过来限制了权威政治的运作范围,其经济发展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刺激、调动下,保持自身的活力。而中国原先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就此而言,今天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要实现旧的权威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新型权威政治体制转变,完成权威政治的全面改造,真正作到该集中的集中,该下放的下放,从根本上摆脱过去那种“一收即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困境。因此,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威,恰恰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一方面要通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转化职能等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权威体系运做的高效化,并逐步规范政治权威运做的范围和方式,避免政治权威对经济过多、过死的干预,把政治权威的功能逐步转移到制度化的秩序建设,转到运用宏观调控,消除对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上来。进而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使中央权威建筑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不断完善权威系统运做的监督体系,有效地抑制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环境分析	( 1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巨大成就和曲折发展	( 1 )
第二节 影响和决定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环境因素	( 5 )
第三节 优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环境的基本思路	( 17 )
第二章 东亚各国或地区政治改革环境分析	( 22 )
第一节 东亚各国和地区战后政治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23 )
第二节 导致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 47 )
第三节 八十年代以来东亚政治改革的路径及民主化	( 68 )
第三章 经济因素对政治改革的影响	( 88 )
第一节 经济因素对政治改革影响的理论分析	( 88 )
第二节 经济因素对政治改革的实证分析	( 93 )
第四章 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因素	( 109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 110 )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	( 118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社会变迁	( 127 )

<b>第五章 影响东亚政治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分析</b> ·····	(140)
第一节 日本政治改革的社会原因·····	(140)
第二节 四小龙政治改革及其原因分析·····	(154)
第三节 东亚政治转型的社会原因分析及其展望·····	(162)
第四节 东亚金融危机和政府模式的转型·····	(176)
<b>第六章 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b> ·····	(18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政治运行机制下的官僚主义·····	(184)
第二节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小农意识·····	(193)
第三节 宗教因素与政治稳定及政治改革·····	(203)
<b>第七章 影响东亚各国政治改革的文化因素</b> ·····	(228)
第一节 儒家传统与东亚文化的政治特征·····	(228)
第二节 文化与东亚政治变革的进程·····	(237)
<b>第八章 比较与借鉴</b> ·····	(250)
<b>参考文献</b> ·····	(259)
<b>后记</b> ·····	(261)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环境分析

政治改革是全面改革深入发展的标志,对于经济改革等各方面改革的最终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就,也遇到了明显的阻力和曲折。之所以如此,既有认识判断和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原因,又与客观环境方面的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只能在既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创造,不可能超越这个既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因此,实事求是地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环境进行分析,不仅是正确认识二十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实际历程之必要,更是积极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进一步向前发展之必要。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巨大成就和曲折发展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环境,需要对这场改革的基本情况先有一个总括性的了解和把握。所谓政治改革,主要是指政治理论、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关系结构三方面的改革和变革。二十多年来,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所遇到的曲折和阻力也很明显。

从政治理论方面看,二十多年前占主要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思想

解放运动中已被彻底否定，现代化建设成了全党全国“最大的政治”。与之密切相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也在改革开放伊始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取代了。最近，经济发展被全党全国进一步公认为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思想被全党全国公认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纲领”，更将二十多年来政治理论方面的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这方面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其主要表现，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清理和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思想影响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有些地方竟将这种政治理论方面的改革称作“逆风千里”，公开进行制；二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交替之际，由于国内国际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企图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思潮重新泛起，政治理论改革的深入推进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直到 1992 年邓小平观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才重新坚定了改革的航向；三是与新的政治理论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每遇政治理论改革深入推进之际总要跳出来进行对抗，这已经成了二十多年来政治理论改革发展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万言书”，江泽民“七一”讲话发表之后的“联名上书”，均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

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看，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比如，废除党政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交替；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取消党委机关中实际上成为政府相应部门上级机关的“对口部”，还一度减少了党政领导干部的兼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逐步加强，正在逐步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作用逐步得到重视；以多种形式和渠道

不断探索对党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机制,努力防范和严厉惩治滥用权力特别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干部任用、考核等各环节加大公开性和透明度;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广大农村村民委员会的“海选”得到了令人欣喜的普遍推行,等等。但是,二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也经历了明显的曲折。在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后的头十年里,遵照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的思想,改革的矛头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体制。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主要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然而,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国际发生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指导实际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和转变,由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变成了注重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这个变化,意味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原来直指旧的政治体制“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攻坚战”,转成了坚持和完善那些本来就很好或比较好的原有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的“外围战”。这个转变在80、90年代交替之际那样特殊而严峻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那以后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把改革重点重新调整为解决旧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致使这个“总病根”的危害继续延续和加剧,致使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得以继续存在和泛滥,给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造成了严重的阻力

和危害。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已经明显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成了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阶段向前推进的掣肘。道理很清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要求在内的巨型系统工程,任何一方面的滞后都会影响整个系统工程的进度。长期不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总病根”的问题,势必导致政治民主进程放慢,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进程的影响决不是无足轻重的。

从社会政治关系结构方面看,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内部各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革。二十多年前,我国社会中居于政治主体地位的是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被统治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还有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和原工商业者。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逐步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根本性变革。按照学术界比较权威的研究结果,认为我国社会目前已经形成了 10 大社会阶层:(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2)经理人员阶层,即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阶层,即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即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5)办事人员阶层,即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事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6)个体工商户阶层,即拥有少量私人资本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7)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即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事

非专业性、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8)产业工人阶层，即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9)农业劳动者阶层，即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职业并以此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即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不包括在校学生)。这10大阶层的人员，除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犯罪分子以外，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的主体。这种社会政治关系结构，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社会政治关系结构相比，更为世俗化和复杂化了。不过，这不是对过去那种社会政治关系结构按照既定蓝图直接进行改造的结果，不是依靠国家机器和行政权力对过去那种社会政治关系结构进行干预和重塑的结果，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必然，是由经济改革决定和推动的政治改革的必然。这种必然，一方面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促使其更加迅猛、更加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公、阶层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能否正确、妥善地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命运。

## 第二节 影响和决定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环境因素

环境乃诸种客观外在条件的总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不同的事物需要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对同一主体要产生不同的影响。环境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了的环境对主体的影响

自然会发生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定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的环境决定的。具备了一定的环境,某一事物就会产生和发展;这种环境改变了,处于该环境中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说,任何环境对某一主体都包含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和不利的消极因素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或者是此长彼消,或者是此消彼长。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也是这样,它之所以得以启动并持续二十多年地不断向前推进,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大环境中占主体地位的许多积极因素决定的;它之所以遭遇阻力和曲折,是由二十多年来中国大环境中仍然存在着的若干消极因素影响所致。当然,影响和决定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还有改革主体自身的原因,这同样是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客观环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作用,大都要通过改革主体的内在反应才能表现出来。不过,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客观的外在环境,主体自身的内在状态和反应,只能在研究外在环境时相应地谈及,不可能详尽地展开。

那么,影响和决定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 一、历史环境

历史发展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上一段历史发展的状况势必成为一下段历史发展的既定前提和外在环境。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赖以立足和开始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和积累了全国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但是,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就发生了越来越

严重的主观主义的偏差。其主要表现,一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过急过快,主要以行政手段推进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对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要求注意不够,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二是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无视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盲目地搞所谓“大跃进”,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一度严重泛滥,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愈益加剧,将所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视作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断言这个危险要反映到党内,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主要根源。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持续发展和扩大,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国民经济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给党和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物极必反,亏重始盈,历史的灾难往往会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沉重的历史悲剧迫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会发生愈益严重的主观主义偏差?为什么这个偏差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持续扩大,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为什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之久而得不到纠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才得以结束?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全党全国对上述重大问题的思考逐步得到了共识。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

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样一来,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就势所必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显然,新中国成立后将近三十年的历史环境,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得以启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历史环境中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指向。基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人们可以更直接更深刻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可以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推上一条不归路。但是,这个历史环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际推进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二十多年间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当一些人身上形成一种思维惯性,留下一一种潜在祸根。特别是,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和相当一些人特别是相当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很难和这种“左”的指导思想真正一刀两断。一遇适宜时机,他们就会旧梦重温,习惯性地滑入“左”的思维轨迹,消极地对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甚至会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淡化、弱化和消解这种改革。二十多年来政治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和曲折,大都与此有关。



## 二、经济环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改革必须以适宜的经济环境为前提。二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经济环境,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实现了突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此后不久,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对外开放也迈开了比较大的步伐,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样的经济环境,对于政治改革的全面启动无疑是十分有利的。邓小平之所以在1986年下半年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摆上日程,正是基于对这种很有利的经济环境的考虑和分析。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之所心能在全国范围内势如破竹地迅猛展开,也是由于这种很有利的经济环境的强劲支撑。只可惜,这个很好的势头仅仅保持了不到两年,就因国内国际一系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骤然消退了。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企图以“反和平演变”取代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政治体制改革几近夭折,经济体制改革遭到巨大阻挠,国民经济发展急剧下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难之中。

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挽救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命运,政治体制改革也得以重新启动。特别是,由邓小平提出、由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及此后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深入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经济环境。这主要因为:(1)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确立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平等观念,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社会交换为